

论近代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的意义

熊月之

摘要 近代上海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意外地成为中外利益共同体。治外法权、租界存在、战时中立是这一共同体形成的政治前提，华洋混处、面积广阔是这一共同体存在的空间基础。这一共同体发轫于小刀会起义以后华洋混处局面的出现，定型于庚子事变以前，其突出影响表现为持续增强租界安全岛功能、强力保障上海枢纽港地位，以及超常的自我增强功能。其安全系数与生产要素集聚互为因果，其溢出效应惠及整个上海地区，对于各色有权、有财、有才的人，吸引力特大，包括政要、遗老、政客与众多文化人。这一共同体明显地呈现西强中弱、西主中辅特点，但中国在这个共同体中也获得巨大利益。上海能够成为中国多功能经济中心、民族资本主义大本营、历代政府主要财税来源地，上海能够吸纳那么多的人口，成为中国多种人才高地，成为中国多方面文化中心，都与这一共同体密不可分。

关键词 近代上海 租界 中外关系 利益共同体

作者熊月之，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8)06-0133-13

近代上海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意外地成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由于租界的存在，欧美列强在这里有重要的经济利益、文化利益与政治利益，中国历代政府（从晚清、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在这里也有重要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利益。租界的控制者是欧美列强，但租界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中外各种利益在这里相互补充、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甚至相互依存。这使得近代上海城市不光在文化上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中西哪一方面都不占优势^①，而且在经济、社会方面也是如此。这种并非主观设计出来的中外利益共同体，对于近代上海城市的诸多方面，对于近代中外关系，乃至对于整个近代中国，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一、中外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近代上海成为中外利益共同体，关键在于治外法权与租界的存在，在于租界由华洋分处变为华洋混处。

1845年英租界设立时，中英两方面的设计与遵循的原则，都是华洋分处。还在1842年10月，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偕未来上海领事巴富尔从南京来到上海，考察未来居留地的位置，所选地方是与县城隔开一段距离的外滩一带。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英商所租土地，都集中在那一带。1845年英国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所议定的《上海土地章程》，对于华洋分处有明确规定。章程第十五条规定，租地范围内华民不得自相议租，亦不得再行建房招租华商。第十六条规定，华人可以到英人租地公建市房中进行买卖交易，但不能租房。为了防止外国商人单户租地面积太大，致使租界范围太大，章程特别规定，日后英商租

① 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章克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页。

地,每家不得超过十亩,免致先到者地方宽大,后来者地方窄小,如租定后,并不建造可以居住、贮货房屋者,即系违背条约,应由地方官会同事官查明,将其地基拨给别家租赁。^①这些规定具有明显的隔离外商、限制外商的意图^②。事实上,华洋分处的原则在租界初期是得到切实遵守的,英、美、法三租界都在县城北面,且面积均不大。

上海租界华洋分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关节点为小刀会起义。1853年9月至1855年2月,上海发生小刀会起义,县城被小刀会占领,大批华人涌入租界。至1854年初,租界已有华人两万多人。对此,英国领事、租界当局都持反对态度,因为这违反了当初中外关于居留地的相关条款,而且难民乱搭棚屋,对市政管理、城市卫生,都造成很大麻烦。但是,外国商人欢迎这样的局面,因为大量难民涌入租界,其中的富人带来了可观的资金,穷人带来了廉价劳动力,这么一来,商业繁荣了,房地产业便大有可为。英租界实行的是富人自治制度,租界重大事项,均由租地人会议决定,并不是英国领事独断。租界外国商人从自身利益出发,赞成华人入住。于是,先前的华洋分居一变而为华洋杂居。1854年7月11日,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召开租界租地人大会,通过了《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删除了此前土地章程中有关华洋分处的条款,认可了华洋混处的事实,并决定设立工部局以管理市政,设置巡捕以维持治安。

从法律层面上说,1854年这次土地章程的修订是不合法的。因为,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规定,今后关于章程条款的修改,应由英国管事官与上海地方官“会同酌定”^③,而这次章程的修改,却是由外国领事单方面草拟、在租界租地人会议上通过,然后才移文上海道台核明办理的,并没有经过中西会商的程序。但是,当时上海地方政府,事实上已经瘫痪,上海道台吴健彰先是被小刀会起义军拘捕,后被释放,此刻正忙于镇压小刀会起义,忙于通过海关收税,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提供经费效力,对于修订后土地章程除了照办,别无选择。

华洋混处与华洋分处,一字之差,但是就租界影响而言,则有天壤之别。混处,使得华洋各种利益具体而微地混杂、夹缠、融合在一起,难分难解,势必促成中外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而分处则不然。近代中国有26个租界,有些是华洋分处,如广州沙面租界设在珠江中的一个半岛上,与外界区隔得很清楚,禁止华人居住;九江英租界则在四周修筑了高高的围墙,设四座大栅门,朝启夜闭,禁止界外华人往来。这两个租界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就远不能与上海租界相提并论。

小刀会起义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对租界发展影响深远的事件,即中国军队被禁止通过或驻扎租界。1854年4月4日,英美驻沪海军,会同租界内主要由商人组成的义勇军,为了阻止前来镇压小刀会的清军借道和驻扎租界,与清军在泥城浜一带发生了一场规模很小、时间很短的战斗。清军惨败,死50余人,英美联队死5人,伤13人。^④这就是所谓的“泥滩之战”。英美联队对于清军的战斗,得到了小刀会的配合。正值清军与英美联队战斗时,城里的小刀会将士冲出西门,凭借一个个人工掩体,向清兵营垒进攻。清军不得不分兵抗击。英美联队乘机加强攻势,猛烈炮击。清军腹背受敌,纷纷逃窜,遂致惨败。一位在场的美国人认为,“在我个人看来,叛军的意外合作,对清军发动了殊死进攻,多亏于此,我们才轻易得胜;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结局将会是一场灾难。”^⑤这次战斗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自此以后,中国军队被禁止进入租界,军人不能持械进入租界,中国警察也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于是,中国在租界的防务权、警务权都被剥夺了。

华洋混处局面的出现,工部局、巡捕房的设立,中国军队被禁止通过或驻扎租界,加上稍后出现的会审公廨,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租界成为中国政权难以管辖的“国中之国”。

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第一次凸显在世人面前,是太平军进攻上海期间,上海中外力量联手抵抗太

①③ 英租界1845年《土地章程》中文本,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682—684、684页。

② 华洋隔离政策是从广东十三行制度延续下来的,五口通商时期,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与上海,实行的都是华洋分处的隔离政策,这些地方所设租界或居留地,都与华人集聚的城市保持一定距离。

④ F. L. Hawks Pott,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Beijing: China International Press, 2008. p. 30.

⑤ William S. Wetmore, *Recollections of Life in the Far East*, Shanghai: North-China Herald Office, 1894. p. 10.

平军。1860年6月至1862年6月,太平军在攻克苏州、杭州等江浙重要城市以后,先后三次进攻上海,均被击退。租界自1854年实行华洋杂处以后,华人便成为租界居民主体,华人绅商在租界人数日多,利益日大。至于租界的洋商,其商业伙伴本来就多为华商,彼此有许多共同利益。租界西人与华界亦有多方面联系,单传教士在华界所设的教堂便有多座。基于在上海城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利益,外国殖民主义者与华人官僚绅商结成了反对太平军的联盟。1862年1月,他们联合成立中外会防局,正式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太平军,英法等国驻沪领事、驻沪军队司令,上海道台吴煦,著名绅商应宝时、吴云、潘曾玮、顾文彬等均参与其事,乃至合署议事。会防范围包括租界与上海城厢内外,其中法租界、上海县城和董家渡地区,由法军防守;英租界及县城北门及附近城墙,由英军防守;英法租界治安,由租界内各自义勇队和巡捕维持;城内治安由上海道台负责。美国冒险家华尔组织的镇压太平军的洋枪队,是外国出人、出武器,上海官绅出钱。正是在中外力量联手抗击下,太平军进攻上海才最终遭致失败。

1863年以后,上海城市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与加强,到1900年以前已完全成型。

其一,会审公廨设立。即使按照不平等的所谓领事裁判权,华人在租界内犯罪,仍应由中国惩治。但是,租界在50年代由华洋分居变为华洋杂居以后,英、美领事便乘机夺取了华官在租界的司法权,擅自在领事法庭上审讯租界内的中国居民。1864年英国领事在公共租界组织“中国法庭”,凡有关外人利益之案件,外人均得陪审。1869年,经上海道与英国领事会商,并经总理衙门和领事团批准,正式成立“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简称会审公廨。这个机构确立了外国领事观审会审制度,规定凡涉及洋人的案件,必须由领事或领事派人会审。按照这个章程,纯属华人之间的案件,领事不得干涉。但在以后的实际过程中,领事仍不断加以干扰,且陪审官权力往往超过中国谳员。法租界也设立了同样的机构,其陪审官权力之大更甚于英美租界。会审公廨的设立,是领事裁判权的扩大,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侵夺。它使得租界成为清政府的法外之地,对上海城市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影响。

其二,战时中立。自太平军战事以后,每遇战争,无论是中国国内战争,中外战争,还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与外国的战争,上海租界都无一例外地宣布中立。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驻沪领事即宣布,“中法虽因越南失和,而上海守局外之列”^①。中国政府默认了这种中立。^②1884年8月21日,法国总领事李梅要求上海道邵友濂对法国侨民予以保护。几天后,清政府谕令沿海各地,“对敌国商民,仍应一体保护;凡该法国官吏、商民、传教师等,如愿留居我国,各安生业者,仍予一视同仁,照常保护;其有干预军事者,一经发觉,应按国际法重办”。^③战争期间,法国驻华使馆由俄国代管,上海法租界相关事务相应由俄国领事代管。对此,上海道台亦予首肯。1885年6月中法战争结束,战时状态解除,三色旗又飘扬在法租界上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政府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书面保证,说万一发生战争,他们不会对上海及其邻近地区采取敌对行动。^④甲午战争爆发之后,上海道台与外国驻上海领袖领事会衔发布告示,“通告租界诸色人等,各国商人照常贸易,凡和平之日商亦加保护”。^⑤依照国际法,所谓中立,至少是关于三国之间的一种相互状态,其中二国交战,另一国置身战事之外,不偏不倚。所谓中立,本出于自择,出于自愿,并不出于外力压迫。租界既非主权独立国家,则对于任何战争,参与与否,租界当局本无权决定。因此,租界之中立,既无国际法依据,也不是经各国规定之中立区,而是在列强以武力为后盾的情况下得以实现的,其实质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非法侵夺,其结果使得租界的地位俨然如同中国之外的独立国。诚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上海公共租界有“独立国家之形状”,而“宛然成一世界文明诸国保护之

①《益闻录》,光绪十年七月十四日。

② 李育民认为,法租界在中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在国际关系史上是极为荒诞的。按照国际法,两国交战,它们间的条约和各种关系,均自然取消。中法之间发生战争,中国方面完全可以收回法租界。可是,当时清政府从未有此打算,以致法租界通过这种“中立”,竟然能够保存下来。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4页。

③《上海法租界的发展时期》,《上海通志馆期刊》第1辑,第3期。

④ 日本总领事致领袖领事函,1894年7月25日。参见郭泰纳夫:《上海会审公堂与工部局》,朱华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29页。

⑤ 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10页。

下永世局外中立共和国”。^①

其三,混合经济。上海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就逐渐成为中国多功能经济中心。这里是全国内外贸易中心,上海进出口总值平均占全国一半以上,1864年占57%,1900年占53%。^②在转口贸易、国内埠际贸易方面,上海起枢纽作用。从上海进口的洋货,有70%以上要运到内地其他口岸。从内地运到上海来的土货,有80%以上要出口到国外或运到国内其他口岸。^③这里是全国金融中心。自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以后,50年代又有英国的汇隆、阿加刺、汇丰、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也相继在上海开办。上海因此成为外资银行在中国最为集中的地方^④。1897年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办。传统的钱庄在上海也一度很兴旺。1860年代以后,上海钱庄营业重心从南市移到租界。到19世纪末,上海已初步成为全国金融中心,银行数量为全国之冠,中国境内的中外银行的大多数总部设在这里。这里是全国航运中心。1849年英商已开辟上海至香港的定期航班。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长江对外开放,北部沿海几个城市开放,长江航运业和北洋航运业迅速发展。到70年代,上海已形成远洋、长江、南部沿海、北部沿海等比较齐全的航线,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最大物流通道。这里也是中国近代工业中心。1860年以前,外国人已在上海设立十多家船舶修造厂。60年以后,外资工业在上海发展较快,包括船舶修造业、缫丝业、火柴业、石油业、印刷业等。1895年以后,因《马关条约》有允许外国资本在通商口岸设厂的内容,外国人在上海设厂速度加快,规模也较以前为大,纺织业、机器制造业、木材业等发展很快。中国国家投资或以官商合办的两家大企业设在这里,一是江南制造局(1865),二是机器织布局(1889)。民族私人资本企业也集中在这里。

这些外资、中资、官办、民办企业,尽管相互之间有竞争,但是,它们在原材料、劳动力、资金、能源、技术、运输等诸多方面,有着错综复杂的互补、混合、融合的关系。且不说外资企业的员工主要是中国人,原材料主要来自中国,也不说很多中资企业的技术骨干来自外国,机器来自外国,更不用说有的企业原本中外合资,甚至挂的是洋招牌,内涵却完全是中国的。^⑤单说工作环境方面,它们使用的是相同的马路、相同的河道、相同发电厂的电、相同煤气厂的煤气,联系着相同的银行与保险公司,面对的是相同的气候、相同的自然灾害与相同的传染病。

其四,公用市政。市政设施方面,除了租界某些桥梁曾在一段时间内对往来车辆略收费用之外,一般道路、桥梁、大自鸣钟、气象台等,对用户均不另外收费。无论租界、华界,道路、地下排水系统、桥梁等事实上成为所有居民的公用设施,大自鸣钟、气象台等设施所提供的服务,也为所有居民所共享。现代市政管理制度的实施,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使得上海租界相对于中国其他城市来说,更为整洁、安全。这方面的优越性,也为所有居民所共享。到1899年,两租界面积已达35638亩,到1914年以后,更达48653亩,远远超过上海城厢内外的市区。1890年以后,作为现代建筑重要材料钢筋混凝土被用于城市建筑,加大了城市对于人口的容纳能力。到1910年,两租界人口已占整个上海城市人口的48%,到1942年这个比例则上升到62%。^⑥换句话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上海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享用两租界所提供的市政服务。

经济体量大,安全,整洁,管理有序,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更增强了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的集聚功能。还在1897年初,《申报》已载文惊叹上海对各色人等的强大吸引力:“近十年来,各项工艺振兴,局厂林立,远近谋食者,于于而来,在本地之人相识较多,谋生更易,无论男妇老幼,均不忧无

① 今井嘉幸:《中国国际法论》,张森如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152页。转见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第86页。

②④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3、61页。

③ 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一卷(1843—189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

⑤ 据称,1893年以前,规模最大的华商行号都在上海设立代理机构,某些洋行的股份,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系中国人所有。参见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7页。

⑥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2页。

嗽饭处”^①。即以石印书局为例，自点石斋、同文书局等机构创办以后，“他局接踵而起，无虑十余家，于是大江南北，浙水东西，凡操三寸不律之士，多呼朋挈眷旅食于兹，户籍陡增，数以万千计”。特别是缫丝、棉纺织业，“近岁吴松江以北，丝纱各项厂局，方兴未艾，附郭及近乡妇女之尚此为生者，或业缫丝，或业拣茧，或业织市，或业纺纱，朝而往暮而归，其人亦以数千计。虽大半乱头粗服，而其中小家碧玉，挈妹呼姨，娉婷婀娜而来”。^② 1855年上海全县人口不到60万，1865年近70万，1900年已超过100万。租界外侨人口增长与华人同样很快。1860年，上海共有外国人约600人，到1900年，已增加到7396人。英国人这么评论：在1890—1900年期间，上海外国人已经跨越了熟人社会的小型阶段，进入了都市生活的新阶段，每一个外国人都能在他自己的同类人内物色到足够的朋友和熟人，男女性别也逐渐持平，“上海正在成为寓居该地的大多数外国居民的永久性居住地”。^③ 从暂居到久居，这是外侨生活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是上海成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的重要标志。

二、持续增强安全岛功能

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最大的影响是增强了自身的安全岛功能。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预防、救治传染病，减轻传染病对城市造成的危害，二是防止、抗击外力对上海城市的侵扰。

传染病是不受地域限制的。上海租界设立以后，很快便将西方预防、救治传染病的措施引进。还在1869年，《上海港口条例》便规定：“到达港口的船只，凡船上有传染病，均不得靠近港口下游界线一英里之内，应在前桅上挂一面黄旗，无河泊司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下船或上船。”条例规定相关船主必须将所有传染病人送入医院，或强迫他们停泊在港口界限之外。^④ 这就在上海与外地之间，设置了一道传染病隔离带。1872年，鉴于上海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水中存在各种传染病菌，但水上居民的饮用水及烹饪用水全部从中汲取，容易染上痢疾、伤寒等病，并传播到岸上，工部局医务股医生建议对《上海港口条例》第9条规定予以扩大适用范围或强制实施，对所有来沪船只实施入境卫生检疫。1874年6月，上海道兼江海关监督会同各国驻沪领事，拟定《上海各国洋船从有传染病症海口来沪章程》，并颁布8条检疫实施条款。此后，上海一直坚持中外联合实施入境卫生检疫。1894年5月，因为香港等地发现黑死病，上海又制订出5条新的检疫规定。

近代上海大部分时间里存在三个行政实体，及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三家均设有预防、救治传染病的机构。1898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卫生处，下设隔离医院、性病医院、预防接种站等单位，从事防疫等工作。法租界公董局医务处自1896年起附设卫生队，其职能之一也是防疫。华界地方自治机关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自1905年成立起，也设立卫生处，从事防疫工作。民国以后，上海地方政府中一直设有卫生防疫机构。此三家防疫机构，工作区域虽各有侧重，但也互通信息，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晚清时期，租界西医医院持续进行接种牛痘疫苗的普及工作，其接种对象并不限于租界居民。1929年之前，华界接种的牛痘疫苗主要购自租界卫生处。传染病肆虐时，设在租界内的相关防疫机构也会到华界进行帮助。1919年，浦东洋泾镇时疫盛行，广济医院便特派救护医队，前往该镇设立救疫医院，治愈多人。^⑤ 1920年7月，大南门发现有传染病流行，而其地尚无专门防止传染病医院，慈善家陆伯鸿便在那里添建南市时疫医院，聘请德籍医士何理中等担任医务^⑥。1927年，上海专为预防、救治传染病而设立的虹口时疫医院，就是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支持下，由中外热心人士共同兴办的。这家医院所用土地由工部局允准借用，名誉院长为约翰·凯瑟克（John Keswick）与冯炳南，前者为怡和洋行大班，后者为著名华商。院董为虞洽卿、秦润卿、闻兰亭等著名华商，也有如“泼来脱纳”（外文名不详）等西方人士。此医院持续十多年，救助病人难计其

①② 《论沪上各厂女工宜设法防护》，《申报》1897年1月2日，第1版。

③ 徐雪筠等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74页。

④ 上海市档案馆：《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93页。

⑤ 《广济医院将在洋泾设院防疫》，《申报》1920年8月3日。

⑥ 《陆伯鸿拟设时疫医院》，《申报》1920年7月28日。

数。其经费主要由慈善家捐助,工部局、上海电车公司亦有捐助。^①

防止、抗击外力对上海城市侵扰方面,自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战争爆发以后,上海在历次战争中皆处于中立地位。这使得上海在战乱频发的近代中国,成为一个地位特殊的和平岛、安全岛。随着中外在上海各种利益的加大,这种安全岛功能越发增强。其突出标志是东南互保的实施。

1900年,北部中国兴起义和团反帝运动,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集团利用义和团爱国热情对外宣战,英、德、俄、法等组成八国联军进行镇压,华北一带陷入战乱状态。英国担心长江流域也掀起反帝风暴,危及他们在这一区域的既得利益,于是想出兵占领。但是,无论英美等列强,还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特别是在上海有重要经济利益的盛宣怀等绅商,均不愿意上海陷入战乱之中,于是,经过一番交涉,于1900年6月议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实行东南互保。这些约款落实以后,既阻止英国等帝国主义对长江流域的占领,也抗拒了清政府对外宣战的命令,使上海城市避免了一场兵燹。

东南互保的实施,显示了相关官绅与列强坚决维护上海及其周围地区安全的决心。

就在议订《东南保护约款》的6月25日那天,清政府向沿江各处督抚寄来对外宣战的明旨,这对互保约款的订立是个极大的障碍。盛宣怀急电苏州、镇江、江阴、南京、安徽、芜湖、九江、南昌、武昌、汉口、襄阳、龙驹寨、西安、太原、保定、长沙、成都各电报局,要他们对宣战诏旨“不准传抄,如有泄漏,惟该局员是问”^②。互保约款订立第3天,宣战诏书已在上海等地轰传开来,盛宣怀电询刘坤一、张之洞是否坚持原议,刘、张当即表示无论北方事情如何,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一切后果由他们两人“一力承担”。上海各国领事见刘、张态度未变,乃表示维持所议,互保约款在事实上得到落实。

刘、张等人力主东南互保,后来得到清政府的肯定。庚子事变之后,慈禧太后在西安召见张之洞的心腹幕僚梁鼎芬时说:“实在亏他(指张之洞——引者),上岁若无刘、张,东南各省就乱了……全靠他二人,我母子在此稍安。”^③刘坤一等人均因东南互保有功而得到清廷的嘉奖,刘坤一赏加太子太保銜,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均赏加太子少保銜。

清廷对于东南互保结局的认可,对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褒奖,不啻向世人宣布,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是不受任何国际、国内局势变动影响的,哪怕在中外交战的极端情况下,这一共同体也稳如泰山。

此后,清末两次战争,民国多次战争,上海租界均保持中立。

清末两次战争,即1904年日俄战争与1911年的辛亥革命战争,前者发生在中国东北,与上海直接关系不大。辛亥革命战争则与上海直接有关。辛亥上海起义期间,中外各方均自觉地维护租界的中立地位。上海起义发动前几天,租界当局已据各方面情况判断,革命党人能在任何时候占据上海。11月2日,起义发动前一天,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士(Fraser, E)奉命发出告示,要求在华英人既不参与反对清政府的战争,也不参加镇压革命党人的战争,否则,一经查出,即处500镑以下之罚金,或监禁两年以下。11月3日起义发动后,革命党人以“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名义照会英国驻沪总领事,声称上海已经光复,请总领事协同维持租界的治安。辛亥上海起义基本上是和平光复,不光租界无战事,华界也没有发生战争。唯一发生战争的地方是江南制造局,那是清政府的兵工厂,远离县城,更远离租界。

民国时期,与上海地区相关的战争有江浙军阀战争、北伐战争、一·二八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

1924年9月至1925年10月,直系军阀、皖系军阀与奉系军阀在上海周围进行了持续两年多的军阀战争。先是,1924年9月至10月,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对上海的控制权,在上海地区进行了一场齐卢之战,为时一月,战场在浏河、嘉定、黄渡、青浦、松江等地,齐胜卢败。同年12月,直系军阀又与奉系军阀展开争夺,闵行、漕河泾、徐家汇一带皆为战场,直胜奉败。再

① 胡勇:《传染病与近代上海社会(1910-1949)——以平时时期的鼠疫、霍乱和麻风病为例》,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73—75页。

② 《盛宣怀致上海、苏州等电局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1900年6月27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7页。

③ 《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稿》(未刊档案),转见马忠文:《丁未政潮后梁鼎芬参劾奕劻、袁世凯史实考订》,《历史教学》2014年第10期下半月刊。

战,到1925年1月,奉胜直败,上海落入奉系军阀手中。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击败奉军,上海又落入直系之手。无论直系、皖系还是奉系,凡为军阀,都是一丘之貉,都与杀人放火、敲榨勒索、走私贩毒联系在一起。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互相厮杀,反复争夺,狼奔豕突,虎噬鲸吞,给上海郊县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是,这些战事都没有波及租界,也极少涉及华界市区。还在战争爆发之前夕,驻京公使团便要求北洋政府将北起吴淞、南抵上海制造局,周围30英里的地带,划为中立港和中立区。尽管北洋政府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但战争爆发后,各国海军就擅自宣布黄浦江为中立区,禁止江浙海军在江内交战,并正式封锁了吴淞口。成千上万的败兵在进入租界时,均被一律解除武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人武装不但保护租界不受战争侵扰,还保护呼吸越界筑路区域与闸北等华界地区。这样,整个上海在江浙战争中都成为中立区。^①不难想象,假如上海不是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的存在,那不知道会被蹂躏为什么样子!

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上海先是在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前两次未能成功,第三次取得了胜利,成立了由各界代表人物参加的、以工人和共产党员为主的上海临时市政府。时隔不到三个星期,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共事变,从共产党手中夺走了对上海华界的控制权,屠杀了三百多工人和共产党员。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上海工人三次起义,还是四一二反共事变,都主要发生在华界,与租界关系不大。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三次起义,自始至终,其活动区域都明确地限制在租界以外的区域,包括虹口、南市、浦东、吴淞、沪东、沪西和闸北。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对上海城市造成严重的破坏,战争也主要发生在闸北、南市等华界地区。八一三战争期间,上海租界曾两次遭受炸弹破坏,但两次均系意外发生。日军在进攻上海华界时,尽可能避开租界。谢晋元领导的孤军在四行仓库,之所以能坚守达四个昼夜之久,将士之勇敢、建筑之坚固等,固然是重要因素,但不容忽略的细节是,四行仓库地处租界与华界交界线边,东面就是公共租界,附近就有两个煤气包,如果日军用重炮对仓库周边进行攻击,流弹就有可能引爆煤气包,就会殃及租界。所以,日军只能用平射炮和比较能够控制范围的武器对仓库进行攻击。即使在占领了闸北华界地区以后,日军“从那里日复一日地向租界以南的华界南市区开炮,炮弹越过四英里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落在南市。听到炮弹尖叫呼啸,在上海密集的房屋和公寓上空划过巨大的弧形,确实让人胆战心惊。但他们的瞄准精确无误,所有炮弹都落在法租界边界以南五十到七十码外”^②。

正因为其时租界已是中外利益共同体,所以,淞沪战争进行时,苏州河两岸已经呈现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观。诚如著名记者陶菊隐所写:“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③正因为有此奇异格局,才会出现少女杨惠敏游过苏州河给四行孤军送旗的动人一幕,才会出现外国记者在外滩阳台上一边喝咖啡、一边了解战况的戏剧性场景。这在惊天动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绝对找不出第二例。

淞沪战事结束后,中国军队撤出上海,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4年间,苏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部分,名义上还属于租界,但实际上已在日军控制之下。苏州河以南的两租界,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岛”。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照常运行。与租界外面的沦陷区、交战区相比,租界内相对安定,经济畸形繁荣。1937年底,公共租界可以开工的工厂只有400多家,到1938年底已达4709家,一年增加10倍以上,1939年又新设工厂1705家。进出口商行,1937年为213户,1941年增加到613户。全国的轻工业产品仍然绝大多数从上海口岸输出。永安公司在1939年每天平均营业额超过百万元,1941年营业额较1938年增长5倍半,利润额增长11倍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营造业无不迅速发展。^④

①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229页。

② 哈雷特·阿班:《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民国》,杨植峰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4年,第234页。

③ 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页。

④ 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此处数据综合该书第四部,1938—1948年,抗战与挣扎。

“孤岛”时期,上海租界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继续存在,与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一方面,上海是欧美各国在远东地区的商品交易中心。193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欧洲局势的紧张,英、德等国均在某种程度上对进出口贸易实行统制,敌对国之间开展了经济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对英国海上运输线处处加以破坏,对中立国船只进入英伦三岛进行严密封锁。英国与北欧诸国也对德国进行贸易封锁或限制。在这种博弈中,英国将上海当成了原材料和动物产品的市场来源,德国也通过各种渠道,将颜料药品、五金机械、化学产品等商品运送到沪,以换取其急需物资。另一方面,日本经济也需要上海“孤岛”的支援。日本是战争资源基本不能自给的国家,其重工业所需的石油、铁砂、铜等全数依赖进口,即使棉花、木浆、硫酸等工业原料也大多需要进口。在此情形下,上海成为日本获取、转运战略物资以及套取外汇的中转市场。日军对租界实行的是“和平封锁”,即只禁止中国船舶的海上交通运输,对第三国船只虽时有阻拦,但并不完全禁止进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进出上海港的轮船吨位中有将近六成属于中日以外的第三国。当然,日本人也知道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挂着外国旗帜的中国船只。^①

三、强力保障上海枢纽港地位

上海以港兴市,黄浦江水道畅通与否,能否通行吃水日深的大型轮船,直接关系到上海能否确保其枢纽港地位,也直接影响到上海城市的发展。

1870年代以后,科技发达,轮船更新,1880年代至1890年代,长江、沿海轮船逐步大型化,2000—3000吨大船已经频繁地航行于江海之中。吨位大,吃水深,对河道要求便较前为高。1840年代,上海港外国船只平均吃水10英尺,到1880年代已达20英尺。这时,黄浦江却日益淤浅。1840年代吴淞口内外沙大潮低水位水深17至24英尺,到1890年代,水深只有9至15英尺。船舶吃水深度与河道淤浅的矛盾日益突出。早在1872年,上海的旗昌、怡和、太古等轮船公司便联名写信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提出疏浚淤浅河道问题。1877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达文波预测,如果不进行航道疏浚的话,随着岁月的消逝,上海就将和杭州、漳浦、登州、牛庄等许多城市一样,成为远洋轮船不能进入的城市,最终只能沦落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内地市镇地位。^②此后经多次交涉,中外达成必须疏浚黄浦江的一致意见。从1889年5月到1891年9月,上海港口管理当局试用挖泥机对吴淞口水道进行挖深。自1906年至1920年,中外联合对黄浦江水道进行疏浚,在吴淞口岸构筑导堤、顺堤,用挖泥船开挖帆船航道,束窄航道,加深河床,利用潮力自然冲刷,使黄浦江航道稳定地保持一定深度。到1921年,在黄浦江中心处,低水位时水深达到26至28英尺。到1935年,黄浦江航道至少深26英尺,又因潮高至少为6英尺,所以每日航线航道至少深32英尺。这对于保持上海港良港地位,有相当重大意义。诚如费唐所述:浚浦工程每年所捞挖之泥,约有一百万立方米,所经开拓之地面积甚大,深航河道比前为阔,江流行经平坦而微曲之航路而无阻碍,“黄浦江经如此疏浚后,由一无规则而日见淤塞之河道,一变而为良善之航路”。^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黄浦江水道疏浚工程,是中外合作进行的国际工程。1901年9月签订的《辛丑条约》第十一款第二条,特别规定设立黄浦河道局,“经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该局各员,均代中国暨诸国保守在沪所有通商之利益。预估后二十年,该局各工及经管各费,应每年支用海关银四十六万两。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国家付给,半由外国各干涉者出资”^④。将疏浚黄浦江航道问题,作为专项条款写入《辛丑条约》之中,并明确规定其经费由中国与相关国家各承担一半,这充分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国际性。1905年,经中外协商,重新改定修治黄浦河道条款,规定:所有改善及保全黄浦河道,并吴淞内外沙滩各工,统由江海关道暨税务司管理;由中国自行选择熟悉河工之工程师,但要经《辛丑条约》各签署国使臣半数以

① 吴晓波:《跌落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第5页。

② 李必樟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领事达文波187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450页。

③ 《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8册,第340页。

④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007页。

上同意,方可委派;须定期将所办工程及所用各款详细开列,并送驻沪各国领事馆待查;河工全部费用由中国承担,并且不向沿江各地产及来往船货征收税捐。同年,按照这一条款,成立了浚浦局,其职责便是疏浚深航河道,并协助滨岸所有人疏浚各码头前面之河道,为滩岸所有人填筑涨滩,协助海关捞移沉破船只等。正是在中外共同重视、浚浦局持续努力下,黄浦江水道疏浚工程才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①在浚浦过程中,经费来源曾有所变化。1912年4月,中外曾就浚浦事宜达成协议,协定浚浦经费由中国政府每年支用关平银46万两,但事实上,此经费并未到位,而是取给于对于上海商业所抽取之特税收入。^②这种特税的缴纳者,既包括上海的中国商人,也包括上海外商。

四、共同体的自我增强功能

上海中外利益共同体一旦形成以后,特别是庚子事变以后,具有明显的自我增强功能。这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安全系数与要素集聚互为因果。因为战时中立、安全,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中外企业集聚这里,致使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这里,而中外人士、中外企业的集聚,又加大了这里的安全系数。庚子事变以后,上海作为和平岛、安全岛的名声传遍天下,所以,无论是辛亥革命战争、江浙军阀战争、北伐战争,还是抗日战争,中外各方几乎不假思索地都会认为上海安全。于是,每遇战争,上海人口必然快速增加。1937年八一三战争爆发以后,人们记述难民涌入租界的情况:

他们像洪水一样汹涌而来,滔滔不绝——乘着卡车、客车、拖车、推车、独轮车、人力车,或者步行而来。扶老携幼,背负手提,婴儿坐在父辈的肩篮,十一二岁的男孩背着年迈的祖母……上百万走投无路的难民涌进外国租界,在茫茫人海中寻觅立脚之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男女老幼。他们冲进了茵茵草地和风景如画的外滩公园,占领了门窗前、屋檐下的每一块空地,乃至市中心的小巷夹道……他们甚至闯进了像雨后春笋一般多起来的棺材店,晚上就在棺材里睡觉。^③

与人口涌入相一致,中外各类投资,也集中到上海。诚如张忠民所说:“不论从何种意义上看,近代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同时也是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向中国进行经济扩张的据点和桥头堡。西方各国不仅在上海的政治、经济势力关系错综复杂,同时他们在近代中国的投资活动,绝大部分也都集中于上海”。^④据统计,1930年,列强在华投资额中,英国的76.0%、美国的64.9%、法国的40.9%、日本的66.1%(东北除外)都集中在上海。^⑤中资方面,1932—1933年,全中国现代棉纺织厂共136家,其中64家在上海;烟草制品厂共60家,其中46家在上海;现代面粉厂共83家,其中41家在上海,全国各种现代工厂共2435家,其中1200家在上海;中国现代制造业工人,有43%在上海;上海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1%。^⑥

其二,共同体效应溢出,惠及整个上海地区。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核心部位是两租界,但是,由于租界与华界之间没有天然的屏障,也没有人为的隔离墙,人员、财物都可以自由流动。因此,共同体效应会扩展到整个上海地区。自晚清开始,不少外侨便在租界以外地区,置办别墅、休闲场所,如沙逊家族在西郊建有别墅,外侨在虹口设有公园,在西郊设有乡村俱乐部。1895年,居住在上海租界外的外侨有441人,到1928年这个数字已上升到7895人^⑦。这些地方逐渐成为越界筑路区域。越界筑路区域的实质是半租界,其地价不及租界贵,但比华界地区贵;其安全程度不及租界,但优于华界。尽管在1932年与1937年的两次日本侵沪战争中,闸北、南市等华界地区遭受严重破坏,但是在其他时期,相当于中国其他地区

① 关于黄浦江水道疏浚工程,参见王列辉:《区位优势与自我增强——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演变的多维分析(1843—1941)》,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论文,2007年。

② 《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8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338页。

③ Edna Lee Booker, *News is My Job: A Correspondent in War-Torn China*, New York, 1940, pp. 295—297. 转见华百纳(Bernard Wasserstein):《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周书垚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20页。

④ 张忠民:《略论近代上海城市的国际化与国际竞争力》,《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

⑤ 通口弘:《日本对华投资》,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98—199页。

⑥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0页。

⑦ 王际昌、罗志儒:《上海社会研究的背景》,《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1929年第1期。

来说,整个上海地区都是比较安全的。

1930年,南非法官费唐受邀来沪调查上海问题,他向各国外侨、各类团体发出调查问卷,询问上海何以会成为中国经济中心,何以发展如此迅速。遍查各国外侨、各类团体的答复,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强调上海的安全特点。英国商会在陈述书中写道:

商业工业利益集中之主要原因,系在于外人管理租界所给与之安全,以及享有条约特权各外国对于租界之保护,中国当道之政治干涉,得以免除,不受中国官吏非法处分之自由,亦得有保证,以及租界所给与其居民之个人保障,均足吸引众多之各级华人,尤能吸引殷富商贾,使在租界内享受生命财产之完全保护。而若辈之对于沪埠兴盛,亦殊有助力。^①

英国商会特别指出,“所谓安全者。系指安全字样之完全意义而言”,包括生命安全与个人、企业财产安全。对于财产安全,陈述书写道:“公共租界内,无论货物或地产,未经相当之法律手续,不得扣押或收用。倘因放宽路面,或办理其他市政,而强迫征收地产,则必按照正当地价,而对于所须收用之产业,给与合乎情理之补偿。上海之公立及私立堆栈,所存货物甚多,此种保障,极为重要”。相比之下,“在与租界毗连之华人统治各区域,以及中国其他城邑,辄可不经法律手续,而将财产扣押。试观在公共租界以外及中国其他各部分所有公开活动之抵制日货组合,此项组合,虽未经政府承认,但得将华商所有之日货没收,并将所没收之货物公开拍卖,或私自处置,且不经法律之许可,得将货物所有人以罚金”^②。

针对费唐的提问,日本商会在陈述书中指出,安全不光对上海的外国人,而且对中国的商人、企业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从近代上海历史来看,正是安全因素,这里才发展如此快速:

在一国国内,政治常有扰乱,社会民众之安宁,颇感缺乏。如中国者,倘不设立一种特别区域,如公共租界,使其居民,得以其地之有相当特权,能在生命、财产方面,获得充分保障之保证,则外侨将难于安居,并从事于商业活动,而使上海得兴盛如今日。除外侨利益外,华人户口之非常膨胀,亦为公共租界所促成。上海初经开辟以供外人通商之时,人口只约二十万,自是加增之速,殊可惊人,而尤以1853年,匪首刘丽川窃据县城以后,及约在太平军变乱之时(1860年至1862年),增加为特甚。华人之纷纷徙居公共租界,系因其为可以避难之惟一地点,至为明著。迨地产章程经于1854年公布,江浙及长江流域各省之居民,其徙居公共租界借求庇护者,又接踵而至。自是厥后,每有一次内战及类似之纷扰,公共租界之发达,每增加一次。近年以来,乱事频仍,社会与政治之纷扰,继续无已,更使上海之人口加增,最后乃臻至今日大可惊人之繁庶。此种事实,表示一般华人方面之一种坦白承认,即若辈宁愿徙居公共租界,处外人保护之下,得获安全,而不愿住居公共租界以外,为外人保护所不及,而自处于继续不断之纷乱与危险。^③

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的自我增强功能,对于各色有权、有财、有才的人,吸引力特大,包括政要、遗老、政客与众多文化人。

辛亥革命以后,晚清遗老或对民国政权心怀不满的名人郑孝胥、陈焕章、缪荃孙、沈曾植、秦树声、胡湘林、陈夔龙、沈瑜庆等,均以上海为安身之地。改朝换代之际,君臣之义、道德操守对于旧臣来说,是人人都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是一次重大考验。历史能提供的选择有三:一是忠于朝廷,以身殉国;二是逃亡外国,苟且偷生;三是认同、顺从革命宗旨,如黎元洪、程德全,还有很多临时反正的知县、知府。第一、二种选择,对于一般人来说,殊非易事。第三种选择,分两种情况,一是真诚拥护革命共和,那在转变时内心没有痛苦;二是并不拥护革命、共和,而仅作权宜之计。对于一向以仁义道德律己责人的士大夫来说,那就会带来极大的内心痛苦。既属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权直接管辖的租界的存在,为那些既不愿以身殉国、也无法逃亡外国、又不拥护革命共和的清廷士大夫,提供了另外一种存在空间:到租界做遗老。这样,既无杀身之苦,也无亡命之难,又无降敌之讥。用郑孝胥的话来说:“余今日所处之地位,于朝廷无所负,于革党亦无所忤。”^④于是,租界遗老,成了民国初年一大特殊社会景观。租界的存在,为他们保持道德的圆满和生活的安宁,提供了一片干净土。这些遗老先前在任时,多有积蓄,因此到了租界,多

①②③ 《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8册,第356、358、378页。

④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58页。

能购房置业，过上比较舒适的日子。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继续拖着长辫子，用清朝纪年。严复、陈三立、郑孝胥在民初上海，都一直拖着辫子。

上海租界是众多达官贵人的居留地，也是众多失势政客的藏身所。李鸿章的子孙、曾国藩的女婿、盛宣怀的家族，居家都在上海，这比较自然，因为他们自晚清起便在上海生活、投资。一些在别处为官经商、本来与上海没有太多关联的人，也来这里安家落户，就与上海的安全系数特别有关。比如，曾任云贵总督、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原在两广、四川、山西等处为官，民国以后息影上海。严复在天津等地为官，但将家小安顿上海。郑孝胥还在北京、汉口等地为官时，已将家庭安置在上海。陈三立、陈夔龙等人本来与上海没有多少关系，民国初年也移居这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种达官设家上海的情况便更为普遍，党国要员白崇禧、何应钦、孔祥熙、孙科等，在上海均有居所。民国初年，皖系军阀将领徐树铮 1924 年在战争中失利以后，便躲进上海租界，召集旧部，以图东山再起。暂时得势的直系军阀齐燮元、孙传芳等要求将其“引渡”，遭到租界当局拒绝。在公共租界当局的安排下，徐得以安全地避地伦敦。1933 年，在天津度过一段隐居生活之后的失势军阀段祺瑞，为了躲避日伪势力的拉拢，也避地上海，度其余生，直到 1936 年逝世。

上海租界对各种文化人引力很大。上海文化市场特别发达，对于流动性较强的专门人才有磁石般的引力，包括教授、文学家、艺术家（音乐、舞蹈、雕塑、绘画、书法、建筑、戏剧、电影）、编辑、记者、律师、工程师、医师、会计师等。晚清时期，已出现全国各地文化人集聚上海的壮观。1898 年戊戌政变以后，各地新型知识分子纷纷汇聚上海。如容闳在政变后逃出北京，来到上海，隐匿租界之中。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而被革职，离京南下上海。蔡元培在政变以后，离京南返，先在绍兴任教，而后来上海。1900 年北方战乱，又驱使一批新型知识分子进入上海。严复先前执教于北洋水师学堂，战乱发生后，匆忙离津赴沪，此后即将家安在上海。天津北洋大学堂有相当一批学生，因战乱而南迁上海，转学于南洋公学，南洋公学为此专门添设了铁路班。1903 年上半年，南京陆师学堂有 30 多名学生，因闹学潮，退学来沪，进入爱国学社。章士钊是其中为首者。此外，零零星星从全国各地用来上海的各色知识分子，数量众多，难以枚举。仅以 1903 年为例，这年在上海从事各种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后来又较著名的知识分子有：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吴稚晖、张继、于右任、马相伯、陈范、马君武、张元济、刘师培……他们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湖北、陕西、四川等全国各地。有像蔡元培、张元济、汪康年这样中过进士、在社会上已有一定声望的人，也有像章士钊、叶瀚、柳亚子这样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这批人中产生了许多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名记者、国学大师、文学大师、小说家、诗人、律师、政治家等。

辛亥前后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全国很多地方发生战争，政局持续动荡，驱使一批又一批文化人进入上海，有的是从外地来的，有的是从外国来的。比如，1910 年 8 月，伍廷芳从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公使位置上卸任回国，便定居上海，上海既非他的故乡，亦非他此前任职所在地。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张东荪便从北京潜回上海。同年，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回国，先在天津老家任图画教师，1912 年初转赴上海，教书、办报。自 1917 年之后，南北分裂，北京失去富庶的西南五省，税收日蹙。1926 年，长江以南各省，皆处独立状态，北京政令不出直、鲁、豫三省，而这三省由于战乱，残破不堪，北京政府财源早已枯竭，甚至连大学教授的工资也大量拖欠，发不出来^①。就政治而言，皖系、直系、奉系军阀先后控制北京政府，纷争不断。特别是 1926 年 3 月，段祺瑞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爱国民众被打死 47 人，伤二百余人，震惊中外。北洋政府还下令通缉国共两党居京要人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等，朱家骅、蒋梦麟、鲁迅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4 月，奉军入驻北京，查封《京报》，逮捕枪毙该报社长邵飘萍，并搜查各报社及大学。北京武装警察队会同奉军宪兵，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包围搜查俄国大使馆等处，拘获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六十余人，李大钊等旋被杀害。北京陷入恐慌时代，大学教授及新闻记者等纷纷离京。^②梁实秋对此有生动描述：

①②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年，第 249、253 页。

民国十六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到了南京近郊,当时局势很乱。我和余上沅都在东南大学教书,同住在校对门慕巷四号,我们听到炮声隆隆,看到街上兵慌马乱,成群的散兵游勇在到处拉夫抓车,我们便商量应变的方策,决定携眷到上海再说。于是把衣物书籍装箱存在学校图书馆里,我们闯到下关搭船到了上海。学校一时无法开学,后来开学之后我们也不在被续聘之列,我们只好留在上海。我们到上海,是受了内战之赐。

这时节北方还在所谓“军阀”的统治之下,北平的国立八校经常在闹“索薪”风潮,教员的薪俸积欠经年,在请愿、坐索、呼吁之下,每个月也只能领到三几成薪水,一般人生活非常狼狈,学校情形亦不正常,有些人开始逃荒,其中一部分逃到上海。徐志摩、丁西林、叶公超、闻一多、饶子离等都在这时候先后到了上海。胡适之先生也是这时候到了上海居住。^①

除了梁实秋述及的诸人之外,朱自清、沈从文、章衣萍等也都在这段时间到达上海。有些人先是到了南京、广州、厦门,但最终又折返上海。鲁迅便是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很短时间后来到了上海的。

寓居上海的文化人中,自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占很高比例。梁实秋曾说:“那时候留学生在海外受几年洋罪之后很少有不回来的,很少人在外国久长居留作学术研究,也很少人耽于物质享受而流连忘返。潘光旦、刘英士、张禹九等都在这时候卜居沪滨”。^②据邹振环、忻平研究,民国时期生活在上海的归国留学生很多,留法归来的有陈绵、巴金、梁宗岱、黎烈文、李健吾、戴望舒、王力、周太玄、李丹等;留英归来的有陈源、吕叔湘、徐志摩、伍蠡甫等;留美归来的有胡适、穆藕初、赵元任、王造时、罗念生、唐钺、冰心、梁实秋、何炳松、余家菊、潘光旦、李安宅、章益等;留日回来的最多,如张东荪、刘文典、郭沫若、成仿吾、陈望道、李达、李汉俊、陈启修、周佛海、田汉、夏衍、张资平、谢六逸、郁达夫、周昌寿、郑贞文、刘呐鸥、傅子东、王亚南、夏丏尊、楼适夷、穆木天、王学文、杨之华、郑伯奇等。^③留学生来源地很多,但那么多人最后选择上海作为其居留地与事业发展地,是上海城市对于留学人才拉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诚如自法国留学归来、曾翻译司汤达《红与黑》的四川人罗玉君所说:“当年离开巴黎时我就想,只要这个世界上有地方放下我的书桌,有地方出版我的译著,有年长的年轻的读者喜欢我的书,珍藏我的书,那地方就是我眷恋的……正因为如此,巴黎留不住我,欧洲留不住我,四川太凋敝也留不住我,留住我的恰恰是上海。”^④

在以上海租界为核心区域的中外利益共同体中,中外并非平分秋色,而是明显地呈现西强中弱、西主中辅的特点。且不说工部局、公董局的权力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也不说占租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长期被剥夺在租界的选举权利,即以经济而言,这一共同体的主要获利者也主要是外国人。租界的外贸、金融等方面,主要控制在外国洋行、商人手中,房地产亦绝大部分亦为外侨所占有。1929年以前,公共租界已估价的21441.319亩土地,为140个地主所有,其中只有两人是用中国人名字注册的,其余均为外国人。在公共租界购有土地的260个公司及各式机构中,只有4家是中国公司,其余均为外国公司与机构。尽管这些注册的外侨、外国公司中,有些是挂着外国人、外国公司名号的中国人与中国公司,但其主体部分是外国人与外国公司是无疑的。^⑤当然,中国在这个共同体中也获得了巨大利益。中国近代化事业能够持续前进,上海能够成为中国多功能经济中心,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中国通商银行能够开办并取得不俗的成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上海能够取得相当可观的发展,上海能够为历代政府主要财税来源地,“为中国国库收入之主要来源”^⑥;上海能够吸纳那么多的人口,成为中国多种人才高地,成为中国多方面文化中心,都与这个共同体密不可分。

中外双方在这个共同体中,也是相互依存的,没有租界提供的安全与法治,上海就不可能那么繁荣。

①② 梁实秋:《忆新月》,王晖主编:《梁实秋文集》,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6年,第326、327页。

③ 邹振环:《西书中译的名著时代在上海形成的原因及其文化意义》,《复旦学报》1992年第2期;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修订版)》,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④ 金平:《上海眷恋》,《文学报》1990年2月15日。

⑤ 王际昌、罗志儒:《上海社会研究的背景》,《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1929年第1期。

⑥ 《法国商会陈述书》,《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8册,第367页。

同样，没有那么多中国人居住在租界，租界也不可能发展到那么大体量，外国人也不可能从中获得那么大利益。诚如英国侨民在 1920 年所说，如果没有数量巨大的华人的存在，如果没有华人与外国人结成“贸易共同体”，就不可能有上海租界的繁荣。^①

近代以来，人类形成性质各异、大小不一的各类共同体，有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其中有些是自觉建立的，有些是自发形成的。以租界为核心区域的上海中外利益共同体，是在中外关系磨合中、经多种力量博弈而自发、逐渐形成的。这一共同体在其运行过程中，也含有自觉的成分，其中有一条主线相当明显，即对中外双方共同有利。这是东南互保得以实施、共同治理黄浦江得以进行、上海繁荣得以持续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周奇）

^① 这位英国侨民是李德立（E. L. Little），他说：“我们与华人贸易，并且从他们那里收税。我们知道他们在租界的存在，极大地增加了租界的财富。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如果华人不在这里，我们的货物就没有市场。因为他们在此对我们有利，所以我们才鼓励他们来……如果华人不在这里，我们会去找他们，因为我们是贸易共同体，为了建立我们的市场，我们必须和中国人在一起。”“Report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Ratepayers,” *The Municipal Gazette*, April 9, 1920, No. 688, p. 155.

Modern Shanghai as a Sino-foreign Interest Community

XIONG Yuezhi

Abstract: Shanghai had developed itself as a Sino-foreign interest community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since the Small Swords Society Uprising in 1853 when the Chinese fled to settled down in the foreign settlement managed by the westerners, and this Sino-foreign interest community was based on the extraterritoriality,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settlement or concession and its neutrality, which made Shanghai a most safe place for the people and fund, and therefore Shanghai became an attractive city to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foreigner. Although the westerners were dominant in the Sino-foreign interest community, the Chinese benefit from it, which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hanghai.

Key words: modern Shanghai, foreign settlement, Sino-foreign relation, interest community